

### 员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一二·九”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切齿痛恨。他们出动军警便衣监视封锁校园、诱骗学生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聆听政府方针”，强令学生复课，强迫各大院校提前放假，妄图以此来阻挠学生的爱国热情，分化和削弱学生的爱国力量。

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和破坏，爱国学生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如何展开斗争才能更有效地发动起全国人民，才能更深入地推动全国爱国运动的发展？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党及时发出指示，指出：“争取华北民族危机的出路，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而是华北凡有民族意识与自觉的人民的共同责任。日本强盗之联合中国走狗汉奸一致向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进攻，中国人民亦应建立统一的人民革命阵线来向日本强盗与汉奸走狗还击。”为把平津的学生运动的影响扩大至华北及全中国，必须在“坚决的反对汉奸走狗分散学生力量的提前放假，坚决进行全体学生一致的救国运动下，集中最大的力量，应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工农群众的工作，发动与开展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各地工农士兵群众的反日反蒋斗争和游击运动。而平津近郊之农民与中日士兵群众中，平津学联更应进行有力的活动”。接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也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把自己的组织巩固起来，巩固各校学生救国会的组织，组织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会……”；“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

党和团的指示及时地给青年学生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平津学联决定在寒假期间，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到农村去进行扩大宣传的活动，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泛的民众运动。1935年1月初，平、津两地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共同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他们要探索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救国之路，正如宣传团发表的宣言所指出的，“平津学生联合会并且认为这一次对日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由全国同胞——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和各界同胞总动员参加，才能得到胜利，单靠我们学生是万分不够的。所以我们到各城市和农村中扩大宣传，要求全国同胞一致奋起”。

宣传团分为四个分团，成员大多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1000多人。第一分团以北京大学为主，包括东城各大中学校；第二分团由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等西城、南城各大中学校；第三分团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西郊的一些学校；第四

分团由天津法商学院等天津院校组成。宣传团的内部组织十分严密。每团分成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又有队长、宣传员、先遣员、交通员、组织员、调查员、救护员等。

宣传团于1937年11月1日，分别从集合地出发，向固安汇集。一路上，宣传团以演讲、表演救亡戏剧等各种方式，向沿途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讲述学生下乡宣传的意义和目的；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悲惨境遇；农民痛苦的根源在于日本的侵略和国内地主阶级的欺压等等。他们沉痛的语句催人泪下，他们激愤的声调又使人义愤填膺。一位群众听了他们的演说后，激动万分地跳上台说：“我们以往不知道痛苦的来源。日本鬼子的压迫、地主老财的摧残、亡国的剧痛是我们民众能够忍受的吗？我们为了活命，我们要同民族的敌人和一切恶势力拼命！斗争！”群众激昂的情绪也使同学们深切感到，在那一张张悲愤的脸上显现着不屈的神色，在那如林般高高举起的手臂中蕴涵着无穷的力量！有的队员说：“我们现在才发现群众情绪的高涨和意识的伟大。一切被禁锢在罪恶的城市里面的人们，他们把广大的群众遗忘了；他们只知道群众是卑微的、低劣的，他们不知道群众是真诚的、纯洁的。”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蛮横阻拦甚至武力逼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与敌人作过坚决的抵抗后，宣传团撤回了平津。但他们撒播下的抗战救亡的种子，却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了根。平津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 国共两党秘密接触

1935年的华北事变，已经暴露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这迫使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中的亲英美派不得不考虑抗日问题。而抗战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解决与中共的关系。

还在1935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就已意识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在陕北的红军“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对中共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凭武力所不能消灭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有苏联的支持，蒋介石要争取与苏结成对日军事同盟，就不得不考虑通过接触、谈判来“收编”红军，并达到“溶共”的目的。于是他便一面着手与苏结好，一面追求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对话。

当时国民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陈立夫也考虑到：“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至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于是蒋介石就委托陈立夫专门负责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与谈判。

首先是派邓文仪、陈立夫等去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

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潘汉年联系。邓文仪当时是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王明与邓文仪在1937年11月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事先还征得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由潘汉年与之进行了试探性接触。

邓文仪先是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后，打算与中国共产党谈判。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南京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3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

王明当场表示反对邓文仪把内蒙古划为红军根据地和作战区域的建议，也不同意邓文仪所谈的统一形式。王明再次强调了“八一宣言”的精神，仍表示中共十分愿意同国民党团结抗日，并建议国民党直接同国内的中共和红军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领导人谈判，商谈合作抗日的具体事项。

与此同时，陈立夫也极其隐密地前往苏联，但还是为日本特务侦知。蒋介石惊恐不安，急召其回国。

随后，中共代表团决定召潘汉年回国，具体负责谈判工作。

经过双方联系人的频繁穿梭往来，~~1937年~~1937年 7月，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在此之前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著名~~ 红军将领曾致书蒋介石、张学良等 ~~著名~~ 国民党将领，呼吁：“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处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这封信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会谈中，陈立夫提出三点要求：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二，红军保留 ~~10000~~ 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政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到南京各机关服务。三，如果军队问题能够如此解决，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汉年反驳说：“这是蒋先生仍站在剿共的立场，想‘收编’红军，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请周恩来出面谈判，潘汉年则坚持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不会出面，即使出面也没什么意义。

双方争执不下，会谈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接着双方又在南京进行会谈。陈立夫坚持不肯让步，

还威胁道，日德都在拉拢蒋介石参加反苏阵线，如果事成，红军处境岂不更糟？面对国民党一方的无理要求，对陈的威胁潘汉年毫不妥协，蒋先生果真如此，我们今天也不会在此谈判了。陈立夫只好连忙表示，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战线。会谈仍无结果而散。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几次秘密会谈所以失败，完全是蒋介石坚持解除中共武装的僵硬立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他对此又恨又怕。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了原则，进一步努力寻求打开新局面的契机。

### 猿瑶东北军参观红军阅兵式

东北沦陷后，几十万东北军未放一枪一弹即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退出白山黑水，被蒋介石驱使着到西北对红军发动“围剿”。

可是在战场上，东北军却总是吃红军的败仗。往往是东北军仗着飞机大炮装甲车气势汹汹地冲向红军，却不料扑了个空；待要循着红军的踪影追击时，偏偏又陷入了红军优势兵力的合围，长途追击本来就已成为疲惫不堪的“强弩之末”，哪里还有力量抵御从四面八方带着震天的喊杀声冲过来的红军！几个回合下来，东北军连连失利，损失了好几个精锐师。

红军在战斗中抓了一大批东北军官兵。对于他们，红军不是简单粗暴地对待，而是采取宣传教育的方式，启发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红军耐心细致的工作，使许多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其实，东北军大部分中下级官兵也都和红军一样是穷苦人出身，都同样地受过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红军相处的日子一久，他们对于红军的本质认识更加清楚，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进步，就连原来一直比较顽固的，也不得不对红军竖起了大拇指，连声称赞：“红军真是一支好样的队伍！”

为了帮助东北军觉醒，红军为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专门开办了军官训练班。这天是1947年11月1日，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们正准备和红军教官们一起搞联欢，突然一个消息传来：周恩来副主席邀请大家参加红军的阅兵式！大家马上沸腾起来，议论纷纷：“你听了没？是周恩来邀请咱们去的！”“以前只跟红军打过仗，还没看过他们的阅兵式，今天可以看个新鲜了！”

军人作风，雷厉风行。学员们迅速排成了整齐的长队，跟着教官走到了阅兵场。

天气阴沉，远方黑沉沉的云紧紧地压在山头上，似乎随时都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温度也很低，学员们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身上的棉衣捂了捂，一个个好奇地东张西望。

红军阅兵部队陆续有秩序地来齐，并进入了事先指定的位置，一动也不动，肃静地等候。

学员们小声地议论着：“唉！真让人失望，就来了些步兵和骑兵，骑兵还少得可怜。哪像咱们搞的阅兵，步兵、骑兵、大炮、装甲车、汽车……那才叫威风！”“你别提那些，光看这些步兵，连机关枪也没多少，都是拿步枪、挎大刀的！”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讲话了，学员们赶紧安静下来，瞪大了眼睛盯着这位他们又敬又怕的“共产党的大头目”。只见他衣着简朴，和学员们平日里见过的普通指挥员没什么两样。学员们还很细心地看到周恩来虽瘦，目光却炯炯有神，当周恩来向他们这边看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心头一震。周恩来的讲话很简短，也很有力，他号召东北军与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学员们望着他，全都心里一热：抗日，那还有话说！

简短的讲话之后，阅兵式就开始了。只见红军一队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昂首挺胸地走过来，一个个都是那么的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学员们认真地瞧着，目光随着红军队伍的移动而移动，想看出个究竟来。他们发现，红军战士的大刀全都擦得雪亮，即使是在阴天也似乎映出闪闪寒光来；红军战士的步枪也都保养得很好，没有一星半点污浊附着在上面；红军骑兵的训练也很好，连马儿的步伐都很整齐，踏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就像出击时敲打的鼓点。学员们由刚才的轻视逐渐化为敬佩之情，尤其是当他们惊诧地发现有许多红军战士穿得十分单薄还一丝不苟、令行禁止时，不由得一个个抚摸着自已身上的棉衣，惭愧地低下头去……

## 源 张 国 焘 另 立 “ 中 央 ” 阴 谋 破 产

张国焘虽然狂妄地在卓木碉会议上另立了“中央”，但由于他这个“中央”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并不合法，再加上朱德同志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作贼心虚的张国焘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

但过了几个月，野心膨胀的张国焘终于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的一再劝告，公然向外宣布另立“中央”，以“党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竟要求党中央改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扬言“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分析认为，一方面应同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应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教育、挽救他。考虑到张国焘狂妄自大，中共中央认为还需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来应付复杂的局势。恰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辗转来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委派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做张国焘的工作。

1935年11月16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指出：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做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此外，林育英、中共中央秘书处也多次电告张国焘，对他进行耐心争取。但张国焘却依旧执迷不悟，称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在这种情况下，员月 圆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员月 圆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朱德，指出：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张国焘接到电报之后，获悉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仍然处于犹豫不决之中，不肯放弃第二“中央”。

他虽然也表示拥护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但仍拒绝承认党中央，拒绝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不久形势发生变化，红四方面军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逐渐陷入不利状况；红一方面军在陕北根据地取得重大胜利；红二方面军正赶上来会师。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党的统一领导，就连一直听命于张国焘的陈昌浩也认识到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转而与其他领导人一致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远月远日不得不宣布取消了他的“中央”。

### 缘起 广田弘毅发表外交方针演说

1941年 11月 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外交方针演说，再次叫嚣他那恶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

“……试观中、日、满三国，其关系虽次第改善，然未能谓之归于常道，故吾人深觉更进一步使此关系完全变为常态以强国安定东亚之基础，至为必要。于是帝国政府经慎重审议结果，树立确定的对华方针。此方针大体由如次三项而成：

第一为根本调整中、日两国关系者。即中国勿论在任何形态，不采取以前之非友好的行为及政策，此非反应舍其消极的此种行为及政策，且更进而以举亲善提携之实，积极地加以协办。中、日两国互相对立之事，非独为双方不利，即就东亚大局观之，亦诚属不能忍受者，如中国对于日本出以非友谊行动，或故意利用第三国而行其常套手段，以为逆行东亚安定之事，则此诚属遗憾者不能忍受者也。然中国如在此点能充分觉醒，则日本对于中国发展，有意为有形无形之支援，自不待言。日本由从未如上之大局起见，隐忍自重，以促中国之自省，诱发其对于东亚责任之自觉，以俟其对日转向，然华方亦渐次看透此大局，

约一年前即表示中、日关系改善之意思。

日本政府……即阐明对于邻邦立不威胁不侵略之根本政策，更利用此机，恢复两国国交于常轨，努力进行于两国利害之调整，关于此点，迄今仍无充分之成果，实为遗憾。察中、日两国关系，为完全恢复其常轨，当然须将中国与满洲国之关系，就于常轨之必要，就中、日、满三国各种利害在直接接触之华北方面，尤特别感其必要。然而中国尚未承认其接壤华北之满洲国。加以各方久已基因于地方的特殊传统，在华北一时出现相当之不安空气，然至最近依河北察哈尔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形势遂大为缓和。前述种种，非反应为中日关系之调节，如中、日、满三国关系不能同时调节，则终难求东亚之安定。为达成此目的者，实为我决定方针之第二点也。

中、日、满三国关系，为完全调节起见，首先应使中国承认满洲国之存在，从此树立国交，进而调和双方利害关系，否则不能根本解决，因此希望其能从速一日到来其时期。然而在此期间，华北方面对中、日、满三国关系应采取无使其何等恶化之手段方法，实为必要之趣旨。中国今日遭遇之最大困难者，为共产党之运动，而东亚之不安定，实为赤化运动将来可乘之机会。如中国边境地域自不待言，即内部社会组织，亦甚感其威胁。中国之赤化分子跋扈，当在想象以上。察赤化运动之危险，非限于东亚，不过东亚天地，今日特见其活跃耳。故吾人在此，为东亚世界之安定，应阻止此东亚之赤化运动，使中国免去此种危险一事，非仅为中国之重要问题，且系各国共同之最大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事件，此乃为此次决定方针之第三点。日本为防止赤化，愿与中国缔结种种协定之主旨，即此也。以上三点，为日本政府之确定方针。”

真是一份不打自招的强盗自供状！所谓的“满洲国”是日本从中国东北分裂出来的，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日本分裂中国华北的序曲。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国应该服服帖帖地按日本的意旨行事，接受日本的“有形无形之支援”，早日“觉醒”，将自身领土一块块分割出去再加以承认——这样东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安定——中国灭亡了，不能抵抗了，自然“安宁”了。

广田弘毅的演说，以反苏反共为幌子，充分暴露了日本霸占全中国的狼子野心。

## 遥 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是被国民党当局以武力押回了平津，但爱国青年的热情是武力所压服不住的。还在押解途中，各团就分别成立了新的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以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到来。

宣传团全部回到平津后，中共北平市委根据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新形势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认为应该把在“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过南下宣传锻炼的青年骨干分子集合起来，以之为核心，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以更好地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北平市委决定把“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青年救亡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1935年 10月 1日，北平学联在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上还讨论通过了民先队的《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等文件。

关于民先队的斗争纲领是这样规定的：

- （一）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
- （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